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廖平 著
鄭偉 校點

總編纂 舒大剛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組織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10@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 號)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廖 平 撰
鄭 偉 校點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高慶梅
責任校對:舒 星
封面設計:經典記憶文化 鄒小工
責任印製:王 煒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 鄭偉校點. — 成都: 四川
大學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14-8124-0

I. ①穀… II. ①鄭… III. ①中國歷史—春秋時代—
史籍②《春秋穀梁傳》—研究 IV. ①K225.0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243144 號

書名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著者	廖 平
校點	鄭 偉
出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號	ISBN 978-7-5614-8124-0
印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張	24
字數	59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168.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

電話:(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http://www.scup.cn>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週邊亦屬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善、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乃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化

——《巴蜀全書》前言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群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脈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綜覽巴蜀文化 增強自信熱力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裏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裏不僅有大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文化諸古城遺址、三峽考古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抵禦強辱、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常璩、陳壽、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魏了翁、李心傳、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趙世炎、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樂為蒼生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良多，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釋”“道”交互構

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儒學是其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的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遵（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東坡（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張栻（著《南軒易說》）、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簞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疊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炘有“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爲《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與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爲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爲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入蜀記》和《吳船錄》。洎乎近世，沫若、巴金，蔚爲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群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書》，斥責專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爲“上繼孟、荀、陽明，下啟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

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託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閬中洛下閎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世界上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慎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蘇舜元，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閬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咨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過、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卿、舜元，俱善詩文，號稱“潼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壁、壘，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煥，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促進文化興邦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十世紀後期）又出現了“交子雙色印刷術”，標誌着雕版印刷的產生、成熟和創新，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

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巴蜀文獻為主的《函海》，可視為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製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燃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巴蜀全書》作為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為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儘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

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碑刻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巴蜀全書》的編纂希望為巴蜀的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興擁護前趨，至於搭建橋梁，開闢荊榛，上繼前賢，下啟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在此僅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五月

校點說明

是書又名《穀梁古義疏》《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其初創於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成書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定稿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其後續有修訂，至一八九三年刊印時，已十易其稿。該書歷經於廖平經學“初變”“二變”兩個時期，為廖氏穀梁學之代表作。《穀梁》之學，源出素王，宣、元以後，垂為孤經，東漢以降，漸成絕學。五家傳說，久佚不聞。張靖、程闡、徐邈諸說，湮沒不彰。幸存范甯《春秋穀梁傳集解》，然其依附何休、杜預，不守師法，以攻傳為能。楊士勳雖稱范氏“上下多違，縱使兩解，仍有僻謬”，然未能正之。啖助、陸淳、孫覺、葉夢得、蔡元定等雖知折中，卻未有書以闡明之。廖平“痛微言之久隕，傷絕學之不競”，“遂發憤自矢，首纂遺說，間就傳例，推比解之”。廖氏對此書自視甚高，寄意甚嚴，用心亦勤，嘗於山西巡撫張之洞宴上稱：“若《古義疏》成，不羨山西巡撫矣！”

全書十一卷，書前有黃印清、嚴式誨、張預、廖平等所作之序，按魯國十二公次序排列，莊、閔二公合為一卷，其餘十公各自一卷。是書《敘例》稱：首明古義，說本先師，推原禮制，參之《王制》；次釐全經大義，屬辭比事，條而貫之，並綴以表圖；旁及三傳異同，辨駁何、鄭，糾范釋范，靡不加詳；終以諸國地邑山水圖。此書旨在發明范甯以前之古義，“存漢師之遺說，刪范、楊之野言”，博徵博引，推原禮制，以證本經，其持羣說之平，守漢師之法，導來學之路，“較清代《補注》《釋例》諸家獨乎過之”。其中，廖氏發現《穀梁》禮制與《禮記·王制》所載相符，提出以禮制平分今古之說，成為其學術“六變”前三期的理論依據，並據此研究其他經典，尤其是為《公羊》《左傳》的研究創造了條件。以《穀梁古義疏》為中心，廖平穀梁學逐漸形成了一套完備的體系，至一八八五年，廖氏編成《穀梁春秋內外編目錄》，共計著作三十七種，凡五十卷。蒙文通先生評曰：“《穀梁》解經最密，先生（廖平）用力於《穀梁》最深，著《穀梁古義疏》《釋范》《起起廢疾》，依經之例，以決范、何、鄭氏之違失，而杜後來無窮之辯。植基堅厚，後復移之以治《公羊》《左氏》，皆迎刃自解。”是書在經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與價值，舒大剛先生論曰：“《穀梁古義疏》以《王制》為綱領，專門發明漢人古義，使千載墜緒得以發揚光大，成為一部足以取代晉人范甯《穀梁集解》的新疏。清儒於十二經皆著新疏，唯《穀梁》缺而無書，廖平此書正可填補空白。”此書為廖氏經典注疏中最為學界稱道之作，亦為清人穀梁學的扛鼎之作，列入中華書局“清人十三經注疏”計劃之中。該書版本主要有六種，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湖南周文煥刊本（簡稱“周本”），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日新書局本（簡稱“日新本”），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渭南嚴谷孫刻本（簡稱“十三年本”），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鍵為張榮芳、黃印清刻本（簡稱“張黃本”），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成都鴻寶書局刊本（簡稱“鴻寶本”），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渭南嚴式誨

刊孝義家塾叢書本（簡稱“家塾本”）。根據家塾本又有三種影印本，《續修四庫全書》本、一九六七年臺灣文海出版社《國學集要》二編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影印本。周本、張黃本、十三年本現已不存，現存日新本、鴻寶本、家塾本，其中家塾本為廖氏最終之定本。

此次點校：

（一）選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本為底本，該本以廖平注疏為主，參以廖宗澤補疏而成。同時，以鴻寶本、《穀梁古義疏》（邵積意點校，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十三經清人注疏》本）為主要參校本。

（二）經、傳文字以阮刻《十三經注疏》為準，對於廖平改經之處，不改原文而出校記說明。

（三）凡注中引文，皆一一核對原文。由於廖氏引書，或節引，或轉引，凡屬形近而誤及文意歧義者，皆徑改正字；凡屬同義轉引者，則一仍其舊，並出校記。

（四）對於注中引文，參考學界已有之成果，主要有：

經部：《十三經注疏》（阮元校刻，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本）、《易緯乾鑿度》（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緯書集成》本）、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吳格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十三經清人注疏》本）、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春秋元命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緯書集成》本）、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四庫全書》本）、劉寶楠《論語正義》（高流水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十三經清人注疏》本）、劉向《五經通義》（《玉函山房輯佚書》本）、許慎《五經異義》（《漢魏遺書》本、《玉函山房輯佚書》本）、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上海書店，一九八八年影印《清經解》本）、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新編諸子集成》本）等。

史部：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班固《漢書》（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劉向《古列女傳》（《四部叢刊》本）、徐元誥《國語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中華書局，二〇〇二年）、杜佑《通典》（王文錦、王永興、劉俊文、徐庭雲、謝方點校，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等。

子部：儒家類：王先謙《荀子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一九八八年《新編諸子集成》本）、孔鮒《孔叢子》（《四庫全書》本）、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一九九二年《新編諸子集成》本）、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本）、石光瑛《新序校釋》（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鍾肇鵬《春秋繁露校釋》（河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雜家類：陳立《白虎通疏證》（吳則虞點校，一九九四年《新編諸子集成》本）、戴聖《石渠禮論》（《漢魏遺書》本）、崔豹《古今注》（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兵家類：司馬穰苴《司馬法》（《四部叢刊》本）、《十一家注孫子校理》（楊丙安校理，一九九九年《新編諸子集成》本）；法家類：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新編諸子集成》本）、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鍾哲點校，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新編諸子集成》本）；術數類：瞿曇悉達《唐開

元占經》（《四庫全書》本）；類書類：歐陽詢《藝文類聚》（汪紹楹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太平御覽》（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宋本）；小說家類：袁珂《山海經校注》（巴蜀書社，一九九二年）等。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鄭偉

穀梁古義疏序

西漢五經家學，今惟《春秋》公羊、穀梁尚存。魏、晉以來，微言大義晦眇不章，徒以文字異同，爲左氏家參考而已。有清中葉，公羊學始大盛，而穀梁猶微，著書傳世者不逮十家，皆未足厭學者之意。蓋公羊家之學，江都《繁露》完書具存，任城《解詁》又依胡毋生條例，兩大師家法未亡，故治之猶易。《穀梁》則師說久湮，惟有范武子《集解》。范氏以鄭君家法說《春秋》，鑿枘既多，舊義益以汨亂，故治之尤難。近人至以《穀梁》爲古文家僞造，以附於《左氏》者，良可喟也。井研先生壯年專精《穀梁》之學，所著《古義疏》數易稿而始定，根原《王制》，溝通二傳，存漢師之遺說，刪范、楊之野言，較清代《補注》《釋例》諸家侔乎過之。昔阮伯元見孔撝約《公羊通義》，歎爲孤經絕學。孔氏書弗能稱是，先生之於《穀梁》，庶近之矣！先生與先文學交最篤，式誨少得侍教，孤露以後，先生時時過從，訓誨有加。既爲先文學作《家傳集序》，乃以此書舊刻疏惡，命爲重刊，剞劂甫竣，而式誨忽遽橫逆，先生復貽書當道，遠勤將護。今春方欲躡屣德門，親謁杖履，勿勿未果，而先生赴至矣。哲人云亡，海內同悼，矧託末契，尤所痛心。猶幸是書刊成，足以慰先生於九京，因亟印行之。先生別有《外編》若干種，惟《起起廢疾》《釋范》二書行世，今附刻於後。他日當求禮堂遺稿，盡刊布之，俾西漢今文家幸存孤學得以益炳於世也。壬申寒露後五日，世姪渭南嚴式誨識於成都賁園家塾。

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敘

穀梁氏之學，孑然而垂爲孤經也，蓋二千餘年于茲。自漢大司農高密鄭公《起廢疾》謂之近於孔子，其爲卜子夏親授與否可不必疑，然要其衷之於聖，不甚相遠。康成《六藝論》又曰：“《穀梁》善於經。”意必較《公羊》《左氏》爲優，而聞見之藹、淵源之真，夫固治《春秋》者之規矩矱括焉，而莫之能越者也。東京而後，漸成絕學。尹更始等五家傳說久佚，延及江左，訾爲膚淺，注者張靖、程闡、徐邈諸人寢以湮沒，幸范氏《集解》厪存，而采用何、杜兩家，難免鑿于師法。楊士勳稱其“上下多違^①，縱使兩解，仍有僻謬”，信哉！然楊自爲書，抑^②又不逮。外此如啖助、陸淳，宋之孫覺、葉夢得、蔡元定輩，雅知折中，而皆未有成書以闡明之。訖我聖清，經師輩出，絕學于是乎復振，凡《穀梁》經、傳，時有條釋，其散見者不一家，而崇尚專家之學。以溧水王氏芝藻爲倡，《春秋類義折衷》見《四庫存目》。踵出者，陳氏壽祺、《穀梁禮說》。李氏富孫、《穀梁異文釋》。許氏桂林、《穀梁釋例》。侯氏康、《穀梁禮證》。柳氏興恩、《穀梁大義述》。鍾氏文烝、《穀梁補注》。陳之《禮說》未經卒業，餘皆有專刻，惟柳氏之《大義述》，彙萃尤備。不意樸學如季平者^③，又能湛思孤詣，承諸名宿之後，時出己見，冀有以集于成。烏虜！吾惡知當世幼學之士，復有風雨閉門，覃研極精，釐然有當，而竟不于昔賢相讓矣乎？季平歸者來謁于都門，述所撰箸《穀梁古義疏》十一卷，十易稟，未爲定本。今郵其《敘例》見示。首明古誼，說本先師，推原禮證，參之《王制》；注疏之外，別撰《大義》^④，屬辭比事，條而貫之；並綴以表，旁及三傳異同，辨駁何、鄭，糾范釋范，靡不加詳，終之以諸國地邑山水圖外篇，都爲五十卷。別白謹嚴，一無遺漏，得其統宗，庶乎鉅觀。執聖人之權，持羣說之平，守漢師之法，導來學之路，不朽盛業，其在斯乎！昔董子有言：“《春秋》無達辭。”吾則未之信也。努力訂成，爭先快覩，謬附起予，竊自多已。光緒癸巳八月，同學友生錢唐張預謹敘於長沙使院。

① 違：原作“韋”，據《穀梁傳注疏》僖公四年楊疏、《光緒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經部二》“《穀梁古義疏》”提要改。

② 抑：《光緒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經部二》“《穀梁古義疏》”提要作“則”。

③ 季平：《光緒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經部二》“《穀梁古義疏》”提要作“廖進士季平”。

④ 注疏之外，別撰《大義》：《光緒井研志》卷十二《藝文二·經部二》“《穀梁古義疏》”提要作“次釐全經大義”。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自敘

《穀梁》顯于宣、元之間，不及一世，東漢以來，名家遂絕，舊說雖存，更無誦習。范氏覘其闕^①弱，希幸竊據，依附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爲能。末學膚受，喜便誦記，立在學官，歷世千載。原夫素王撰述，魯學獨專，俗義晚張，舊解全佚。辛巳中春，痛微言之久隕，傷絕學之不競，發憤自矢，首纂遺說，間就傳例，推比解之。癸未，計偕都門，舟車南北，冥心潛索，得素王、二伯諸大義。甲申初秋，偶讀《王制》，悅有頓悟。于是，向之疑者盡釋，而信者愈堅，蒙翳一新，豁然自達，乃取舊藁重錄之。戊子，詮釋《公羊》，繼有刪補。庚寅，纂述《左氏》。癸巳，讀《禮》多暇，取舊藁重加修訂。雖在會通三傳，而魯學家法不敢稍踰。又舊藁至今十年矣，所說多不同，非大有出入，不悉削之，以存入門之迹。經傳微奧，鑽仰無窮，俟有續得，擬再修補。博學君子，加之匡正，所切禱焉。癸巳三月朔，井研廖平識。

① 闕：日新本、鴻寶本同，疑爲“間”之誤。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凡例^①

一、《穀梁》先師章句、微故著錄《班志》者，魏晉猶有傳本。范氏《集解》不守舊訓，今志在復明漢^②學，故專以舊說爲主。至於范注，聽其別行，不敢本之爲說。

二、《左氏》《公羊》與《傳》同說一經，不須求異。唯漢以後，久已別行。今既別解《公羊》《左氏》，三傳各立門戶，不取苟同，務就本傳立說。然義本相同，後來誤解，因致歧出者，則必化其畛域，以期宏通。

三、何氏《公羊解詁》與《穀梁傳》說多同。傳文各古本互有詳略，非取二傳相推，反不明著。同者是爲推闡本傳，不以膚引爲嫌。今注間有與《公羊》《左氏》同者，亦由本傳推得之，非用二傳也。若傳中所存異說與《公羊》同者，依義解之。

四、《春秋》爲萬世立^③經，《公羊》先師誤以爲救文從質，爲一時之書，與本書經義不合，今不取之。至於三代之說，皆後王三統之義，何君于注中多所引用，今用其例，於一定之中，詳其通變之法。

五、陸氏《釋文》及本傳異文，諸書所詳，今不暇及。至傳文字誤，新所考訂，皆爲標識。有所據改，說見疏中。至於訓詁，人所易明者，不更贅及。

六、《春秋》問辭，弟子皆有所據。然其據文本，禮制、文句并用。何君以下說《春秋》者，引用經中文句，而略于禮制一門，多與傳意相迕。今注中據文，半主禮制，半主文句。

七、三傳言禮制者，每傳多各言一隅，必須合考三家，方成完說。許、鄭訐爭，皆失此旨。今于三傳禮制異同處，據參差互見諸例以說之，務使彼此相發，互文見義，合于禮意爲主，不敢輕事杵擊，動成齟齬。

八、三傳舊例，多文異義同。先師門戶過嚴，彼此相激，不惟不能求益于人，白馬非馬，主張太過，反於本傳有損。今于實不相通者立《三傳異例表》，文異義同者立《三傳同例表》以統之。

九、三傳事實，末節細端間有差舛，大事明文則無同異。後人吹毛索癥，察及秋毫而不見輿薪。今將事實確有不同者，別立《三傳異事表》；其他詳略參差文實諸說可通者，于注中詳之，以見異者千百中之一二，而同者固大且多也。

十、注以《王制》爲主，參以西漢先師舊說，從班氏爲斷。初以本師《王制》用單行中字，班氏以下夾行小字，因與經、傳混，改爲夾注。凡所不足，乃下己意，注所不盡，更爲疏之。以疏附注，故與唐人注疏別行者體例稍異。

① 以下二十三條凡例序號原書本無，爲便於閱讀，故於每條凡例前統一編碼。

② 漢：日新本、鴻寶本作“古”。

③ 立：日新本、鴻寶本作“之”。

十一、《王制》爲《春秋》^①大傳，千古沉翳，不得其解，以《穀梁》證之，無有不合。今作《王制義證》一卷，以附經傳之後，引經、傳及師說注之，以相印證。

十二、《國語》爲左氏作，本孔子創作^②舊說，附會事實而成，爲經作傳，所謂“賢爲聖譯”也。《史記》本紀、世家又本《春秋譜牒》而作。至《左傳》《史記》說事解經與傳異者，皆《左》所無，本弟子推考而出，其文當全見《左氏說微》中，非《國語》原文也。今除《說微》舛異之外，疏中引用實事者，以《史記》爲主，《左》亦間用之。

十三、《春秋》二伯黜陟，立八方伯、七卒正，存西京，收南服，以九州分中外。內四州國則早封之，外四州國則漸引之。夷狄在九州外，《春秋》小統，不治要荒夷狄，凡經所稱夷、戎、狄，多有諱避而託之。舊說多以吳、徐、楚、秦指爲真夷狄者，誤也。楚爲南外四州，即爲諸夏。內諸夏，外夷狄，則夷狄屬要荒，亦非真夷狄也。

十四、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事有本末，前人已詳。至於屬比，殊未盡其義。張氏《辨例編》哀錄此例甚詳，今悉取用，而推本傳例以補之。

十五、董子治《公羊》，禮制與本傳實同。凡微文孤證，本傳先師無說，今悉取之，如制度及軍制、黜陟之類是也。又杜氏《公子譜》本于劉子政《世本》，是本傳師說，今亦用之。

十六、《春秋》新義，不惟損益禮制，名教綱常尤關^③，統繫制度于一定之中，以三統通其變。至於禮義，百世不變，傳中禮制、義理，多本此意說之。至傳義與經小別者，于經下注明本意，傳下則就傳義解之。

十七、六經^④取六合之義，又如黃帝六相。《詩》《書》《禮》《樂》爲四教，法四時、四方。《易》如天，爲空文。《春秋》如地，爲實事。舉《孝經》而實之。是六經^⑤本一貫也。先師說相關之處，多引《孝經》《易》《詩》《書》《禮》《樂》爲說，今仍其義，以明六經相通之實。

十八、《春秋》改時制，所謂“因監損益”，“擇善而從”，託之六經^⑥，于時事無關。人多不明此意，流弊甚多。今于各條間輯周制遺文軼事，以見《春秋》改變之迹，六經^⑦既定，垂法百世，後人不能再言改變矣。

十九、何君《解詁》引用《京易》《韓詩》，考博士之說，本同一家，固不別異。今仿其例，凡本傳佚義，取博士說補之。

二十、《春秋》之作，上考三王，下俟百世，大統之法，多由此而推。今立古今二

① 春秋：日新本、鴻寶本作“六藝”。

② 創作：日新本、鴻寶本作“六藝”。

③ 尤關：日新本、鴻寶本作“實亦在焉”。

④ 六經：日新本、鴻寶本作“六藝”。

⑤ 六經：日新本、鴻寶本作“六藝”。

⑥ 六經：日新本、鴻寶本作“六藝”。

⑦ 六經：日新本、鴻寶本作“六藝”。